

Stefan Zweig



EIN GEWISSEN GEGEN
DIE GEWALT

良知对抗暴力

卡斯泰利奥对抗加尔文

斯蒂芬·茨威格 著
舒昌善 译



Stefan Zweig

EIN GEWISSEN GEGEN
DIE GEWALT

良知对抗暴力

卡斯泰利奥对抗加尔文

斯泰芬·茨威格 著
舒晶善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良知对抗暴力：卡斯泰利奥对抗加尔文 / (奥) 梵威格著；
舒昌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8
(梵威格历史特写)

ISBN 978-7-108-05925-3

I. ①良… II. ①梵… ②舒… III. ①卡斯泰利奥 (1515—1563) — 生平事迹 ②加尔文 (Calvin, John 1509—1564) — 生平事迹
IV. ①B979.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5241 号

责任编辑 樊燕华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07)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8月北京第1版

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12

字 数 270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58.00元



PROMPTE · ET · SINCERE ·



IOHANNES · CALVINVS ·

ANNO · ETATIS · 53 ·

B.

五十三岁时的加尔文肖像



SEBASTIANUS CASTELLO
Grac. litterar. in Academ. Basit.
Prof. Publ.
Natus Anno 1515.
Obiit Anno 1563. O. 49. Dic.

卡斯泰利奥肖像



塞尔维特肖像



坐落在日内瓦巴斯蒂恩公园的日内瓦宗教改革纪念碑，奠基于1909年加尔文四百周年诞辰之际，竣工于1917年。纪念碑的主体雕塑从左至右分别是：法雷尔、加尔文、贝扎、诺克斯。

后世将无法理解，我们在世界出现过曙光之后还会再度不得不生活在像辛梅里安人似的无尽黑暗之中。^[1]

——塞巴斯蒂安·卡斯泰利奥

[1] 此语源自塞巴斯蒂安·卡斯泰利奥的著作《论怀疑之道》。希腊神话中的辛梅里安人(Cimmerian)永远生活在黑暗中。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加尔文攫取权力	17
第三章 “教会纪律”	43
第四章 卡斯泰利奥登场	74
第五章 塞尔维特案件	102
第六章 火刑处死塞尔维特	128
第七章 宽容宣言	153
第八章 良知斥责暴力	184
第九章 暴力扼杀良知	208
第十章 殊途同归	246
茨威格附记	262
本书大事年表和重要注释	264
译者后记	352

第一章 引 言

他身处险境而依然顽强勇敢，他面对死亡危险的临近而依然镇定自若，他在自己的生命被杀戮时依然用毫无畏惧和轻蔑的目光注视敌人，他不是被我们人的同类而是被命运所击倒。他被杀害了但没有被战胜。最勇敢的人有时最悲惨。所以说，令人赞叹的失败足可与胜利媲美……〔1〕

——蒙田

“蚊子对抗大象”——这是塞巴斯蒂安·卡斯泰利奥〔2〕亲笔添加在他撰写的那一册《驳加尔文书》〔3〕在巴塞尔流传的原稿手抄本上的一句话。乍一看，这句话会使人感到纳闷，而且容易被人臆想为，这无非是一些人文主义者的言过其实罢了。其实不然，卡斯泰利奥的话既不夸张也不是自我调侃。勇敢的卡斯泰利奥只是想要用这样一个非常浅显的比

〔1〕 此语见蒙田随笔《话说食人部落》篇。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文艺复兴后期法国著名随笔作家。有《随笔集》三卷传世，其思想内容和文体风格对后世均有深远影响。

〔2〕 卡斯泰利奥生平，参阅《本书大事年表和重要注释》（以下简称《大事年表》）1515年记事〔1〕。

〔3〕 卡斯泰利奥于1554年完成《驳加尔文书》，但生前未能出版，只有原稿手抄本在巴塞尔流传。参阅《大事年表》1554年记事〔6〕。

喻清清楚楚地告诉他的朋友阿默巴赫^[4]，他自己心里是多么明白，而且是满怀悲情地明白：当他——卡斯泰利奥公开指责加尔文出于发疯似的固执己见而杀害一个人，从而也就扼杀了宗教改革所宣扬的良知的自由时，他是在向一个何等强大的对手挑战啊。自从卡斯泰利奥像举起长矛似的举起自己的笔投入这场危险的论战的最初时刻起，他就全然明白：为反对武装到牙齿的专制独裁的绝对优势而进行的任何一种纯粹思想上的斗争都是处于绝对的劣势，因而这样一种大胆行为必败无疑。在加尔文的背后有成千上万人的支持，有各种拥有武装的国家暴力机构的支持；而一个孤立无援、手无寸铁的人又怎么可能和这样一个加尔文进行争斗和战胜他呢！加尔文依靠自己出众的组织才能成功地将整座城市——拥有数以万计迄今仍然是自由市民的整个日内瓦城市国家——转变为一部死气沉沉的、由他操纵的机器；他成功地铲除了各种独立自主的行为——成功地剥夺了每个人的思想自由，以便有利于他自己独一无二的教义横行霸道。在日内瓦这个城市国家中，凡是拥有权力的一切——所有的官署和职权部门、行政公署^[5]和教会纪律监督委员会^[6]、大学和法院、国家财政机构和道德教化机构、教士、学校、巡捕、监狱——以及见诸文字的一切思想和各种各样的言论，甚至窃窃私语的话，统统都在加尔文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控之

[4] 博尼费修斯·阿默巴赫 (Bonifacius Amerbach, 1495—1562)，瑞士法学家、艺术品收藏家，伊拉斯谟遗嘱和遗产的执行人，卡斯泰利奥的好友，经常在经济上帮助卡斯泰利奥。

[5] 日内瓦行政公署是日内瓦政府。参阅《大事年表》1527年记事〔3〕。

[6] 加尔文于1542年在日内瓦建立教会纪律监督委员会（法语 consistoire），参阅《大事年表》1542年记事〔1〕。

中。他的教义已成为法律。谁胆敢对他的教义颇有微词，牢房、放逐或者火刑就会立刻教训此人，教训他的理由是任何一种思想专制的统治用来扼杀一切争论的强词夺理：在日内瓦只容许一种真理存在，而这种真理的先知就是加尔文。然而，这样一个令人畏惧的人物所拥有的巨大权力还竟然会越过日内瓦的城墙到达远方呢：瑞士联邦各城市都将加尔文视为是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者；新教世界将这个诉诸暴力的基督徒奉为自己的精神领袖；君主们和国王们想方设法要博得这样一位在欧洲建立了除罗马天主教会外最强大的基督教组织的教会领袖的好感。不再有任何时事政治事件会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也几乎不会发生任何违背他的意愿的时事政治事件，因为敌视加尔文——这位圣·皮埃尔教堂的布道师^[7]已变得完全如同敌视皇帝或者罗马教皇一样危险。

而他的对手塞巴斯蒂安·卡斯泰利奥居然想以人类思想自由的名义向这么一个实行思想专制的统治者进行论战，那么，这样一个孑然一身的理想主义者卡斯泰利奥又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确实，和加尔文的难以想象的巨大权势相比，那还真是蚊子对抗大象呢！就对公众的影响而言，卡斯泰利奥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影响微乎其微，而且他还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是一个穷得像乞丐似的学者，靠译书和当家庭教师勉强养活妻小^[8]，他是一个在异国他乡没有

[7] 1536年9月5日，加尔文在日内瓦被任命为布道师。

[8] 卡斯泰利奥一生结婚两次，有子女九个。参阅《大事年表》1542年记事〔2〕。

居住权和公民权的难民，一个双重流亡者^[9]。这个崇尚人性的人其实是既无权又无势，他在狂热的争论不休的信徒们中间完全孤立——在人们陷入盲目的狂热信仰的一切时代都是这种情况。这位谦卑而又了不起的人文主义者多年来一直生活在迫害和穷困的双重阴影之中，过着一种最最清贫的生活。他永远窘迫，但也永远自由，因为他既不和任何宗派有联系，也不痴迷于信仰的狂热。只是当他感到自己的良知已被塞尔维特之死疾声呼唤，从而放下自己安安静静的工作挺身而出，以已经被玷辱的人权的名义谴责加尔文的时候，他的这样一种寂寞生活才渐渐演变为以后英雄般的人生。因为卡斯泰利奥不像他的惯于斗争的对手加尔文那样，周围有一群按照计划组织起来的、抱成团的铁杆追随者可以掩护自己；没有任何宗派——既没有天主教的宗派也没有新教的宗派——会向卡斯泰利奥提供任何援助；他也没有任何高贵的君主——没有哪个皇帝和哪个国王——会像先前庇护马丁·路德^[10]和伊拉斯谟^[11]那样来庇护他，就连那些钦佩他的少数几个朋友也只敢在暗中用窃窃私语鼓励他的勇气。因为持有异见者在所有的国家被时代的疯狂视为如同驮物的牲口一样受折磨和受驱使的时候，一个毫无畏惧的人要为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和被奴役的人仗义执言，并要通过塞尔维特被害这样的个别案例去彻底否定世界上一切当权者所拥有的这样的权力：仅仅由于世界观的缘故而去迫害同一个世界上的另一个人。这时候他是公开站在那个受迫害者的一边呀，那可

[9] 卡斯泰利奥先从法国流亡到日内瓦，又从日内瓦流亡到巴塞尔，故称双重流亡者。

[10] 参阅《大事年表》1521年记事〔2〕。

[11] 参阅《大事年表》1469年记事。

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那可是一种性命攸关的危险！各族人民有时会遇上使人的心灵变得非常阴暗的可怕时刻，卡斯泰利奥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保持着自己清醒和充满人性的洞察力，而且敢于将各种假借虔诚敬畏天主的名义所进行的杀生献祭一针见血地称之为谋杀！名副其实的谋杀！卡斯泰利奥是唯一不愿意再忍受沉默的人，也是唯一大声说出自己对各种非人性的行为深感绝望的人。他怀着深厚的人性情感挑战自己：他要独自一人为自己赞成与反对的一切而斗争。因为谁在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永远无法摆脱胆怯懦弱的时候敢于指责当时的当权者和权力分享者，谁就始终很难指望自己会有支持者。所以，塞巴斯蒂安·卡斯泰利奥在关键性的时刻身背后除了自己的影子以外没有任何人。这样一位搏击奋斗的文人唯一拥有的是无法变卖的精神财富：无所畏惧的心灵中一种不屈不挠的良知——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话又说回来，恰恰是塞巴斯蒂安·卡斯泰利奥从一开始预见到自己的斗争毫无成功的希望，然而他依然听从良知的呼唤去进行这场斗争——恰恰是这种神圣的“然而”和“尽管如此”使这个在人类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中的“无名小卒”永远被赞誉为英雄；在每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看来，仅凭这样一种敢于孑然一身强烈抗议对天下实行恐怖统治的无与伦比的勇气，卡斯泰利奥反对加尔文的论战就已值得世人一代又一代地缅怀。不过，这样一种历史性的辩论就其提出的实质性问题而言，远远超越时代的诱因。因为这场辩论所涉及的并不是狭隘的神学理论——并不是塞尔维特一个人的神学观点，更不是区别自由派的新教教义和正统派的新教教义之间不同的关键性症结。在这场双方相持不下的争论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内涵广泛得多的问题——一个超越

时代的问题：即要拷问我们自己的灵魂^[12]。这一次争论是一场斗争——它固然由卡斯泰利奥拉开序幕，但这场斗争必将会以其他的名义和其他的形式继续进行到底。神学在这场斗争中无非是一种凑巧的时代面具罢了，即便是卡斯泰利奥和加尔文也只不过是作为一种隐藏不露而又无法克服的对立双方的两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而已。不管我们如何称呼这样一种始终紧张对立的两极：称呼为宽容与不宽容，或者称呼为自由与管束，人性与狂热，个性与划一，良知与暴力——其实都无所谓。所有这些称呼无非是要表达一种最内心、最个性化的最后抉择：在每个人的心目中是人道宽厚更为重要呢还是政治性的事情更重要，是通情达理更为重要呢还是拘泥于刻板的条条框框更重要，是自己的人格更为重要呢还是趋炎附势更重要。

这样一种必须一再在自由和权威之间划清的界限，对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正在思索的人来说都必不可少，因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自由——否则，自由就会成为一片混乱；同样，没有自由也不可能有权威——否则，权威就会成为暴政。毫无疑问，在人的本性中深埋着一种神秘的渴求：希望自己能融入社会；但与此同时，人类最原始的梦想在我们心中始终未能泯灭：梦想能够最终找到会极其公正地将和平与秩序赐予人类所有成员的某种宗教制度、某种国家制度或者说某种社会制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宗教裁判所大裁判官^[13]以无情的雄辩证明了，人类

[12] 茨威格在此处引用拉丁语原文：nostra res agitur。

[13] 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俄罗斯著名作家，代表作品有《白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宗教裁判所大裁判官是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人物形象。

的多数原来都害怕自身的自由。事实上，芸芸众生由于面临会使人精疲力竭的众多问题——面临生活的复杂性和责任性，为了避免为众多的复杂问题而操心，期盼天下有一种规矩可循：期盼有一种普遍有效、不会更改和权威性的制度，省得他们自己去动脑筋。——芸芸众生期盼有一个救世主能解决人生的各种问题，而正是这种期盼成了一种真正的酵母：这种期盼为一切社会先知和宗教先知铺平了道路——每当一代人的理想失去热情和光辉时，一个具有诱惑力的人只需挺身而出并且断然声称，是他，而且唯独是他找到了或者说首创了新的救世之道，那么成千上万的人就会趋之若鹜，将自己的信任寄托在这个所谓民族的救星或者说世界的救星身上。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总会首先在世间创造出一种新的理想追求——这大概就是新的意识形态的深奥莫测的意义吧。因为每一个向世人许诺人类最原始的梦想——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清明——的欺世盗名者首先就会从世人身上得到最神圣的力量：献身的意愿和满腔热情。数以百万计的人就会像中了魔似的心甘情愿被压迫、被蹂躏、被宰割，而且这样一个欺世盗名者向世人要求越多，世人就会越痴迷于他。自由——昨天还是世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渴求，他们却可以为了取悦这个欺世盗名者而自愿将自由抛弃，只是为了更加俯首帖耳地服从他的领导，而塔西佗那句古老名言——“我们被投入奴役的状态”^[14]就会一再得以实现，以致各个民族陶醉在充满激情的团结之中而自愿被投入奴役的状态，同时还

[14] 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公元55—约120），古罗马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学家，曾任执政官，倾向共和，反对帝制。主要著作有《编年史》《历史》等。“我们被投入奴役的状态”（拉丁语 *ruere in servitium*）是《编年史》第一卷中的名言。

要赞美抽打在他们身上的皮鞭呢。

一种思想意识——世间最最非物质的力量竟然会在我们这个静谧安详和循规蹈矩的古老世界上一再创造出如此不可思议的蛊惑世人的奇迹：世人很容易陷入这样的蛊惑——他们钦佩并且赞美那些欺世盗名者，因为欺世盗名者们成功地将精神转化为没有思想的物质。然而，恰恰是这些宣扬理想或者说宣扬空想的人一旦取得胜利之后就几乎全都会立刻暴露自己是他们所鼓吹的那种精神的最最卑劣的背叛者——而其后果则是带来无穷的灾难。因为权力会膨胀成为绝对权威，胜利会膨胀成为滥用胜利。那些征服者们并不满足于自己曾激励过许多人为了他们个人的虚无缥缈的理想而乐于去生和去死，那些征服者们全都会陷入这样一种诱惑：要将征服多数人转变为征服全体民众，并且还要将自己的教条强加给那些不参加宗派的人士。那些征服者们并不满足于有自己的驯服工具——他们有自己的附庸、有自己的精神走卒，他们并不满足于自己有那些在历次运动中永远为他们冲锋陷阵的人——不，他们并不满足。他们还要使那些自由的人——那些少数有独立思想的人渐渐成为替他们歌功颂德的人和奴仆呢，并且为了将自己的教条作为独一无二的信仰加以贯彻，他们会以国家的名义将任何不同的意见斥之为犯罪。一切宗教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意识形态都永远重复着这样的厄运：一旦这些意识形态转变为专制，这些意识形态就会酿成暴政。而当一个欺世盗名者不再相信自己的“真理”具有内在的威力而需要采取残忍的暴力时，他就会向每个人天赋的自由宣战。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不管哪一种意识形态都一样——从一种意识形态为了整肃和控制各种异己的信念而采取恐怖手段的那一刻起，这种意识形态就已不再是理想的追